

“文革”后校园文物抢救纪实

○郑宗和

“文革”伊始，清华大学成为重灾区。在“造反有理，革命无罪”口号煽动的群众运动冲击下，学校党政领导顷刻之间被打倒，党团组织瘫痪，打、砸、抢、抄、抓盛行，清华园陷入一片混乱、恐怖之中。接踵而来的“破四旧”狂潮，把一切传统文化、文物古迹和各种艺术品，均视为破除之列。就连校园植树绿化，也诬称为封、资、修的产物，加以破坏。当时校园内被损毁的文物、古迹计有：

匾额三块，楹联一幅：工字厅正门“清华园”匾，工字厅后厦“水木清华”匾，柱廊楹联及大礼堂的“人文日新”匾。

石刻醒狮三对：工字厅正门，工字厅院内，西校门各一对。

早期校友纪念碑（物）五座：闻亭大钟，一教北侧王国维纪念碑，怡春院西侧土山唐孟伦纪念碑，体育馆南侧1919级纪念喷水塔，大礼堂草坪南端1920级日晷。

以上共计12项文物被毁。这之后不久，象征清华的“二校门”，也被推倒。

广大正直的师生员工，对这种废典忘祖的罪恶行径，无不义愤填膺，本人对此也深感痛心疾首。无奈当时本人也在被打倒之列（时任清华附属中技校副校长）更是敢怒而不敢言。之所以有此心情，与本人曾经接触老油漆彩画师王林、建筑大师梁思成有关。

1953年，“修缮工程处”（为1952年三校建委会未完工程和工字厅大修而组建的临时机构）成立，我由机械厂调往该处，担任建筑工会专职主席，从而有机会与老画师王林接触，他是当时京城仍健在的少数宫廷老画师之一，胸存宫廷彩画腹稿数百幅。当工字厅大修近收尾之际，市建工局有关领导派人来校，拟请王老赴苏联莫斯科主持北京饭店（我国在莫斯科建造的清宫式饭店）油漆彩画工程。我与来人先后三次说服动员，都被王老严辞拒绝。情急之下，来说：“这么难得的出国献艺的机会您都不去，是否有点保守？”不想老画师忽然站起说：“老祖宗的技术，怎么能为外国人服务呢？你们说出大天来，我也不去！”说完拂袖而去。王老珍视和保护我国传统技艺的精神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，至今难忘。

1957年10月，校领导决定选派一批干部到各系加强行政工作，我被派往建筑系任行政秘书，期间有幸做了梁思成先生的兼职家庭秘书，每周三四次到其住处，帮助整理先生的来往信函及行政事务。一次我建议系资料室，应建筑一间恒温恒湿室，以利于营造学社图片资料及善本书籍的长期保存。梁先生对此甚为高兴。此后梁先生不时给我讲解文物鉴赏、识别、保护的基本知识，这在当时虽说有点“对牛弹琴”，但梁先生“诲人不倦”的精神，

□ 史料一页

使我深受感动。这对我无疑是文物保护的启蒙教育。

正是因为上述两位前辈的教诲，使我有了解保护文物的信念，相信总有一天被毁的校园文物会重见天日。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校园文物找寻，及后来的抢救修复工作，都是在这个信念的驱使下进行的。

1970年，清华附属中技校停办，我主动申请到校园管理部门（时称革委会农林组）工作。在清理校园时，先后发现了散落在校园内的部分文物残骸。碍于当时的环境，为了防止再次被破坏，只好把它们暂时埋入地下。同时暗地里开始了其他被毁文物的找寻工作。1976年10月，“四人帮”倒台之后，拨乱反正初期，我主动承担了校园文物修复工作。现就各项文物找寻、修复的经过分述如下。

一、醒狮的修复就位。经多方努力，三对醒狮的残骸先后被找到，但已被砸成石块，难以照原样修复。1972年春，从张静亚（曾任行政处副处长）处得知，西校门外北侧河沟内，发现外单位遗弃的石狮子一对。经前往观察，较原工字厅正门前的狮子体量略大，但基本完好。为了不错过这难得的机遇，我们冒着风险，趁周末工军宣传队队员回家度假的凌晨，秘密吊运进校，埋藏在甲所后土山坡。正因为有了这次冒险抢救，才有了“四人帮”倒台后工字厅正门前醒狮的及时修复就位。时值“四人帮”倒台后不久，受迫害的教职工，尚未及平反，因此有人取笑说：“狮子与人先后落实政策。”

二、工字厅内正厅前，原来也有一对较小的石狮，和正门前的石狮同时被毁。时到任不久的刘达校长，见正门前的狮

子及时修复，遂令我和刁会光（时任校办副主任），持其亲笔信去故宫文物商店联系购买体量相同的石狮子，因该店要价过高而作罢。后又到京郊满清贵族墓地去寻找。在海淀区北安河乡找到一对，因系阴宅所作，体态凶恶，只好再次作罢。这时我忽然想起，多年前去北京大理石厂联系工作，见该厂院内散放着一对石狮子，和我校被毁的石狮子体量、体态一致。于是前往联系，该厂欣然同意赠予我校，故得以及时安装就位。为感谢该厂的支援，赠送礼金1500元（不及故宫商店售价的1/30）作为答谢。

现西校门前的石狮子，是在1991年我离休后，有关单位请曲阳石工照原体量重新刻制的。

三、工字厅正门撰有咸丰御笔红印的“清华园”匾额，和工字厅后厦“水木清华”匾额（传说为康熙帝御笔，待考）系园内重点文物，破四旧时最先被毁。1970年后虽经多次暗访寻找，始终未果。1976年7月唐山地震，供应科清理被震损的废品库时，发现了上述两块匾额，虽有破损，但字迹依稀尚存。至于它们是怎么到废品库的，已无从查起。该科老模范张忠，知我在找校园文物，于是趁深夜转交我保存。三个月后“四人帮”倒台，即准备修复。因当时找不到修复文物的合适单位，几经周折，至1977年末，终于找到了市房修二公司古建处，愿代为修复、油漆贴金。于1978年春悬挂就位。

四、“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 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”，以上名句是悬挂在工字厅后廊柱上的楹联，系晚清重臣、礼部侍郎殷

兆镛书写，与“清华园”匾额同时被毁。1970年后，我多方寻找，未能得知下落，可能早已被砸毁。廊柱上的楹联，在“清华园”匾额修复的同时，请后勤职工田书林(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)依旧照影制而成。百年校庆前，根据原始照片重新修复。

五、工字厅后厦“水木清华”景区，临水平台石雕栏杆亦在“文革”初期被毁。栏杆、栏板大部被砸毁，少数被推入水。1978年抢修时，将水中栏杆、栏板捞出，又重新雕刻大部分栏板、栏杆，照原样安装就位。当时修复的栏杆，新旧栏板混装，差异较大，感观不一。人们现在看到的石栏杆，是在1991年我离休后，有关单位照原样重新打制安装的。

六、“水木清华”景区迤东亭(现名自清亭)东北土山上，原筑有一座古亭，日寇侵华时被毁，抗战胜利后，学校从昆明北上复校，为纪念被蒋特杀害的民主斗士闻一多教授，即在原地重建古亭，命名为“闻亭”。亭内正中悬有明嘉靖年铸造的古钟一口，径至四尺，撞之钟声远及三四里，可为师生作息报时。内战时遇有反动军警进校滋事，以乱钟警示全校。解放初期亦作乱钟以防空警报。“文革”破四旧时大钟被拆走，长期下落不明。1970年清理校园时，发现大钟被遗弃在新林院北侧旱沟内，被乱石掩埋。为防再次被毁、盗，遂移地掩埋。“四人帮”倒台后的1977年春取出，运装悬挂就位。

七、西体育馆南侧汉白玉石雕喷水塔，是1919级校友修建的纪念物。“文革”初期“破四旧”时被拆散推倒，围栏石柱被砸毁，围栏铁链不知去向。所幸主要石构件无大损。1978年修复前先更换年

久的给排水管线，继之重新组装就位，并重刻制围栏石柱，安装了新购置的铁链围栏。现今距那次安装已过去了30多年，管线堵塞，已不能再喷水。百年校庆前，移至综合体育馆南侧公园。

八、礼堂草坪南端古计时器“日晷”，是1920级校友献给母校的纪念物。该日晷最初制作时，系由晷盘、晷体、底座三部分组装而成，“文革”初期被毁。1971年清理校园时在西院东侧(即现植物园)乱石中，发现了晷体部分，虽有损坏，但大体完整。为防止再次被破坏，即埋入地下。其余两部件始终未找到。1977年春取出晷体，进行了修补，并请建筑系教师，按照梁思成当年绘制的白描图样，重新设计配制了晷盘、底座，从而得以及时安装就位。

日晷修复安装后，刘达任校长时，张光斗、赵访熊等几位老校长提出“晷盘安错了方向，应予改正”。晷盘方向到底是应该朝向太阳向南倾斜，还是背向太阳向北倾斜，当时我也不清楚。为了慎重起见，安装前我特地到故宫、太庙等处进行实地考察，两处的晷盘方向，都是朝向太阳向南45度倾斜。于是我们严格按照古例安装。刘达校长了解此情况以后，特地命我在一次校长会议上向几位老校长作了汇报说明。高景德任校长时，董树屏等几位老教授，又向他提出相同的问题。高景德校长又命我向几位老教授一一作了同样的说明。日晷修复后，很长时间内，不少同仁向我提出过相同的疑问，我都一一作了解释。为防今后再有此类问题的发生，有必要写此补充说明。

九、“一教”北侧山麓，原有一座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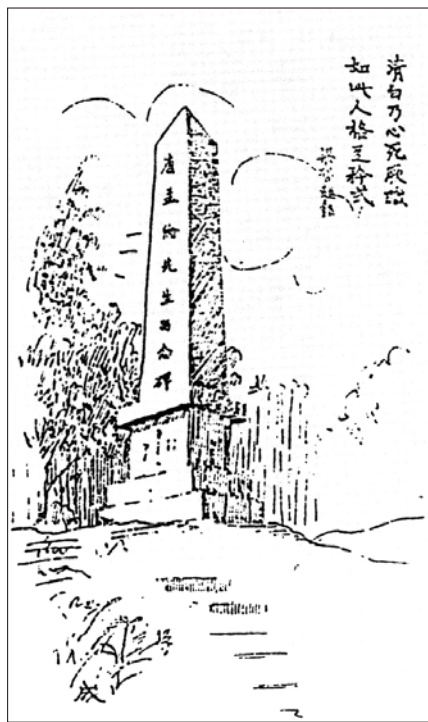
□ 史料一页

严肃穆的纪念碑，正面书刻“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”，这是为纪念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而建。背面碑文由陈寅恪先生撰写。碑式为建筑大师梁思成设计。是我校早期重点文物之一。“文革”初期“破四旧”时纪念碑被推倒，碑座及周边四个石座椅被砸毁，此后不久碑体被人移走。1970年后经多方寻找未获。1979年，一次偶然机会，得知该碑体已被力学系实验室移作实验平台。多次交涉，他们都以实验重要为由不愿交出。后经当时党办负责人何介人出面调解，得以解决。

1980年修复该纪念碑时，从学校东邻的后八家清贵族墓地找来了汉白玉石须弥式碑座。又请匠人重新刻制了两座花岗岩石凳，始得以修复。原碑浑体为青玉石雕刻而成。由于经历了“文革”劫难，致使该碑变成了三种石材，三个色泽混装的纪念物。

以上是“文革”初期被毁校园文物的抢救过程。“抢救”是指突发事件后紧急行为的用词。从1970年找寻开始，到1980年王国维纪念碑修复，前后历时10年之久。就时间而言，不能算作抢救行为。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找寻被损文物，有着复杂、曲折的过程，所以本文开头用了《校园文物抢救纪实》的标题。

“文革”初期被毁的校园文物，据传有两件未能找到——“人文日新”匾和唐孟伦纪念碑。“人文日新”匾确实未找到，至于说唐碑未找到却是我的“托词”。其实在清理校园时，唐碑主体残骸已经找到，之所以未能修复，因当时某领导人随口说了一句不恰当的话：“唐孟伦不过是建校初期后勤主管，修复他的碑没



梁思成遗画：唐孟伦纪念碑

什么必要。”唐孟伦先生1911年起任清华庶务长，任职期间大公无私、勤于政务，深受师生员工仰服，1922年病逝后全校后勤职工念其泽惠，集资在怡春院西侧土山上立碑纪念。我也是后勤战线工作多年的一员，此说于我实难接受。一气之下，将该碑残骸砌入古月堂后山挡土墙内。由于本人的意气用事，留下了终身憾事！

在修复“文革”初期被损文物同时，对抗战时期被毁的三处校园文物也予修复。

一、工字厅院内原有两座太湖石假山，建园时已有之。日军占领时已有塌落，“文革”初期又有损坏，百日武斗后，几成乱石堆。1979年，我特地远赴杭州，请来堆艺名家帮助修复。堆艺前加

建了钢筋混凝土基础。堆艺完成后，得林学院（现北京林业大学）山石专家孟教授好评。

趁堆艺名家在校之际，又请他们完成了“水木清华”景区沿湖岸的山石堆艺工程。现在的北岸山石增高部分，是在2000年学校90周年大庆前校友集资加建的。

二、图书馆一期建筑门前，原筑有一座水池喷泉，日军占领时拆毁，该喷泉铜铸体长期散落在校园内。1958年房8级毕业生将该铜铸体移至二号楼前水池内，作为该级毕业纪念。1980年修复校园文物时，得知该铜铸体原系1922级纪念物，征得房8级毕业生同意，又在图书馆老馆（图书馆二期建筑）正门前建池，为铜铸体重做1922级字样，移来安装就位。该纪念喷泉建成后，近70年内先后三次移址修建，见证着校园建设饱经沧桑的岁月。1990年图书馆第三期建筑完成后，又将该喷泉移建在新馆区庭院内。

三、工字厅正厅西侧，以半壁廊相

联，原建有一客厅，自领一小院。厅前紫藤攀架，厅后透棂观荷，是工字厅院内最幽美所在。1925年，吴宓在此居住，取名“藤影荷声之馆”，并请诗文大家黄节题字精裱于厅内。此后这里便成为文人聚会论诗明志的地方。日军占领时期，拆去藤架，庭院景象被毁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去校史组查询资料时，偶见上述典记，遂提议修复，得校史组赞同。于是依旧照仿制“藤影荷声之馆”匾额，悬于庭廊。至于庭院的景象，系本人根据想象，修复藤架、植藤、植竹、筑曲径，又修建了“山石水景”，肯定与当年景象大相径庭。现庭院内的木质游廊，系2000年工字厅大修时加建的。

以上是本人根据记忆和现有材料写成的。修复时本有记录材料，后因机构调整，人员更替，原记录已失落。本人虽年逾七旬，但仍记忆清晰，想无大误。

（作者曾任学校行政处副处长兼校园科科长。）

重建二校门前

○郑宗和

“二校门”原为学校最早的大门，始建于1909年，原设计人不详，原施工主持人为斐士(E. S. Fischel)。该校门原为青砖砌筑，中间圆拱上镶有汉白玉石。石上撰有晚清重臣那桐题写的“清华园”三个大字。后来随着校园的逐年扩展，1933年学校又建起了新的大门，即今西校门，此后，原大门始称“二校门”。

“二校门”初建时为封闭式，东西两侧筑有矮墙，东连清华邮局旧址，西接原校卫队队部，此况一直延续了40多年。上世纪50年代初期，为便于人员、车辆通行，学校领导决定拆去两侧矮墙，从而使“二校门”更加突显庄重肃美，成为清华标志性建筑。

“文革”初期，1966年8月24日，清